

# 社會記憶與文化建構

## ——以廣州府番禺縣瀝滘村「御賜屏風」故事為例

石堅平

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

### 提要

本文圍繞一組氣勢恢宏的木刻屏風、一個「御賜屏風」的傳奇故事、一種「賢壽宴」的鄉土禮儀傳統，講述了清代中期以來廣東省城附廓的一個鄉村宗族，如何積極響應朝廷加強鄉飲酒禮、實施鄉村教化的號召，運用王朝國家的正統禮儀來創造新的宗族禮儀。圍繞着這個新的宗族禮儀，他們靈活地運用聯壽宴飲、製序稱壽、石刻銘文、御賜屏風、口頭傳說與附會臆想等鄉土機制和文化策略，來發明傳統，改造禮儀，操縱社會記憶，建構出地域社會中強宗大族的社會形象。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權力精英在不同歷史情境下，運用不同的文化策略，賦予同一段聯壽序文不同的社會意義與文化想象，創造出多姿多彩的鄉土文化。

**關鍵詞：**鄉飲酒禮、社會記憶、文化建構、瀝滘、宗族

---

石堅平，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廣東省江門市東成村22號，郵政編碼：529020，電郵：hsssip@163.com。

本文係筆者博士論文的一部份，寫作過程中曾得到中山大學劉志偉、陳春聲、鄭振滿等教授的悉心指導；修改成文時，又蒙中山大學程美寶教授和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此外，筆者持續多年的瀝滘田野調查，也曾得到衛鑑添、衛本立、衛兆良、衛浩然、衛泰治、衛鼎峰等諸位瀝滘父老的大力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如何理解中國鄉村社會，是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人文學科的學者們一直以來孜孜以求、致力探究的課題。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積澱的禮儀習俗與社會記憶，是學者走進田野、了解鄉村所遇到的最直接的材料和最感性的體驗。學術研究的進展已經提醒我們，在方法論上要超越共時態的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模式，將其放置於具體的、動態的歷史進程中，剖析族群、市場、士紳、宗教信仰、國家制度、王朝禮儀等等各種社會因素，如何一步步形塑着鄉村社會的禮儀習俗與社會記憶，以展示出不斷結構化的「結構過程」( structuring ) 的歷史圖景。

蕭鳳霞通過對小欖「菊花會」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不同時期的地方精英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解讀「菊花會」賦予參與者的特定社會身份和歷史意義，將「菊花會」轉化成社會文化資源來創造無數新的地方文化傳統。她提出，要「從歷史角度理解文化變遷的敘述，去掌握華南農村社會活生生的經驗和脈搏」。<sup>①</sup> 劉志偉以明清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社會發展為例，從土地墾殖、宗族發展、神明崇拜、戶籍制度的演變以及族群問題等五個方面，具體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域社會文化結構的動態過程。<sup>②</sup> 他提出，「歷史研究不僅要闡述人們在地域社會建構過程的能動性，也需要反省歷史敘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會建構過程中被結構化，而這種結構又如何推動和規限人們的行動」。<sup>③</sup>

面對盛行於珠江三角洲地區鄉村社會的宗族禮儀與實踐，科大衛、劉志偉將其置於宋明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域社會形成的特定歷史過程中，從王朝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角度來詮釋和理解。他們的研究表明，到明中葉，家廟式祠堂普及化和正統化的過程，是一個士人在鄉村中的地位合理化的過程。地方社會通過改變禮儀，運用皇朝禮制，拉近了地方社會和王權的關係。<sup>④</sup>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宗族組織，就是文人士大夫理念指引下進行的文化創

① 蕭鳳霞，〈傳統的循環再生——小欖菊花會的文化、歷史與政治經濟〉，《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頁99-131。

②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54-64。

③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54-64。

④ 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頁1-20。

造。<sup>⑤</sup>他們認為，宗族的發展與實踐是宋明理學家利用文字的表達，改變國家禮儀，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統性的國家秩序的過程和結果。<sup>⑥</sup>

本文將以廣州府番禺縣瀝滘堡的衛氏宗族舉行的鄉村禮儀——「賢壽宴」與「御賜屏風」故事的嬗變為例，闡述瀝滘地方社會的文人士大夫如何成功地模仿王朝國家的正統禮儀——鄉飲酒禮來改造地方社會，拉近王朝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並不斷地因應着時代的發展，靈活地運用聯壽宴飲、製序稱壽、石刻銘文、御賜屏風、口頭傳說，與附會臆想等鄉土機制和文化策略，來發明傳統，改造禮儀，操縱社會記憶，持續建構和強化衛氏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的強宗大族形象。

## 一、瀝滘宗族社會的形成與地方權勢的競爭

「御賜屏風」故事廣泛地流行於今天廣州市海珠區瀝滘村一帶。明清以來，這裡隸屬於廣州府番禺縣茭塘司瀝滘堡，逐漸形成了由兩個強宗大族——羅氏宗族和衛氏宗族所主導的瀝滘宗族社會。瀝滘地方精英在建構宗族記憶時，均將元末明初視為宗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瀝滘衛氏族譜》稱，在元末邵宗愚叛亂中，九世祖衛克信「父子率鄉人設柵防賊，賊為側目嚙指，戒勿犯，瀝滘堡一境帖然」，<sup>⑦</sup>儼然一位保境安民的傳奇英雄。

明王朝平定嶺南之後，整頓戶籍，推行里甲登記制度，籍蛋戶與無籍之徒為軍戶。「我朝洪武初取嶺表，又明年詔定天下版籍，凡民有色役者，令以色役占籍。十家為甲，十甲為圖，圖積為里，里積為縣。其獠、夷、黎、蛋，有願附籍者，籍之。十年一更，而登降其生死。」<sup>⑧</sup>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為水軍，時蛋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為寇盜，故籍而用之」。<sup>⑨</sup>羅氏宗族的二世祖羅廣成在這一時期甚至一度被籍為軍戶，「得備京衛戍役」，洪武十八年（1385）成功地

⑤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頁27-32。

⑥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3-14。

⑦ 李鳳，〈皇明隱君衛公配安人甘氏合葬墓誌銘〉，見《瀝滘衛氏族譜》（光緒抄本，瀝滘衛鑑添藏），卷2。

⑧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22，〈戶口〉，頁16。

⑨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本），卷143，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癸亥，頁2252。

「表白南還」，脫籍軍戶。<sup>⑩</sup>從有關族譜和契約等文獻資料來看，後來的瀝滄羅氏宗族的戶籍被登記在瀝滄水四十一圖內的六甲、七甲、八甲、十甲各戶之內；而瀝滄衛氏宗族的戶籍被登記在瀝滄六圖內的各甲各戶之中。<sup>⑪</sup>

擺脫籍為軍戶的危機之後，羅廣成不僅「益加警勵奮發，故家日裕而產日增」，「增置田園三十六頃」，而且發展成稱雄一方的地方豪強，干預訴訟。鄉民「雖被誣繫獄者，往往為之昭雪」，「其有爭訟者，不取直於有司，而趨廣成求決焉」。<sup>⑫</sup>羅廣成次子羅宗閏領永樂十五年（1417）丁酉科鄉薦，官至浙江省參政。<sup>⑬</sup>羅廣成三子羅積閏則繼承和發展了羅廣成在地方社會的權勢。正統七年（1442），羅積閏「出粟賑濟，蒙廣東藩臬兩司奏聞，奉旨敕賜義官，旌表建坊，詔賜羊、酒，蠲免其租賦徭役三年」。<sup>⑭</sup>

正統十四年（1449）黃蕭養叛亂，直接衝擊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社會秩序，羅積閏「深入賊巢，喻以順逆，曉以大義，叛眾咸感泣，受命隨公來者達數萬人。有司奏聞，朝廷旌其功，敕賜徵仕郎」。<sup>⑮</sup>黃蕭養叛亂，使地方社會對王朝國家的忠誠和認同問題成為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面對着大兵的剿捕和官員的招撫，鄉民們無論是否參與過叛亂，都需要作出一種選擇和姿態，用各種方法證明自己是『良民』。」<sup>⑯</sup>

面對黃蕭養叛亂之後地方社會秩序的重建，瀝滄地方社會的文人士大夫開始在地方上推行宋儒所主張的宗族祭祀禮儀，以建構宗族的方式來整合地方社會，表達出地方社會對王朝國家的認同。天順二年（1458），羅宗閏致仕歸田，致力於將宋儒主張的祭祀禮儀在家族和地方社會中進行實踐，運用文字和禮儀在地方社會推行教化。<sup>⑰</sup>天順七年（1463），羅宗閏「歸政，置

⑩ 王子倫，〈晉贈大中大夫廣成羅老先生行實〉，見《瀝滄羅氏族譜》（民國廿年〔1931〕本，瀝滄羅多藏），卷10。

⑪ 《瀝滄羅氏族譜》卷12，〈里宅〉；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藏乾隆五十年（1785）衛型端立明大賣基地契等大量契約文書，可以證明瀝滄衛氏的戶籍登記均在瀝滄六圖各甲各戶之內。具體情形，筆者擬另文詳述。

⑫ 石堅平，〈建築榮恩祠碑誌考釋〉，《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47期（2007年4月），頁31-37；王子倫，〈晉贈大中大夫廣成羅老先生行實〉，見《瀝滄羅氏族譜》，卷10。

⑬ 石堅平，〈建築榮恩祠碑誌考釋〉。

⑭ 《瀝滄羅氏族譜》，卷15，〈總宗支圖〉。

⑮ 倫文敘，〈敕賜義官徵仕郎柏憲羅年姻伯行實〉，見《瀝滄羅氏族譜》，卷10。

⑯ 劉志偉，〈地域空間中的國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4-24。

⑰ 歐陽鐸，〈晉授大中大夫子玉羅老先生墓誌銘〉，見《瀝滄羅氏族譜》，卷14。

碑建地為大宗祠。」<sup>18</sup> 成化十年（1474），羅宗閏臨逝遺言，規定將來宗族祠堂田產的輪祀規則與祭祀禮儀，「令大宗子孫掌管置簿，首寫五房小宗派，記其輪應以祀之口存無紊亂。後寫收穀入祠數目，與眾知在支用。」<sup>19</sup>

平定黃蕭養叛亂之後不久，一批取得低級科舉功名的瀝滄衛姓文人士紳，也逐漸以宗族的方式，來推動地方社會的整合。第十一世孫衛璿開始嘗試修撰族譜，但未能完成。<sup>20</sup> 弘治三年（1490），衛通編修好一份瀝滄衛氏小譜，請好友南京吏部官員作序。正德四年（1509），衛綱也編修一份族譜，請湛若水為之作序。正德六年（1511），瀝滄衛氏宗族的文人士紳開始與東莞衛氏進行聯宗，合修族譜。<sup>21</sup>

嘉靖時期是王朝國家祭祀禮儀大變革的時期。王朝國家祭祀禮儀的系列變革，通過文人士大夫的傳播，也推動着地方社會鄉村禮儀的變革。瀝滄地方宗族在此期間取得了更大的發展。羅氏宗族開始由五服以內的小宗譜法所維繫的家族，轉化成為超越五服限制，由大宗譜法所維繫的宗族。嘉靖七年（1528），羅氏宗族重建羅積閏的欽賜義官牌坊和大宗祠。<sup>22</sup> 嘉靖九年（1530），刊刻〈建築榮恩祠碑記〉，碑記中不僅約定嘉靖十二年（1533）開始祭祀始祖，而且規定新的五房輪祀的順序，輪值管理龐大的宗族沙田蒸嘗。<sup>23</sup> 此後，大約在萬曆年間，羅氏宗族首次編纂族譜，由七世孫羅行中負責主持編修。<sup>24</sup>

瀝滄衛氏的宗族建設也是在這個時期迅速崛起的。衛天穰、衛應鰲、衛宇、衛道著、衛叔卿、衛延齡、衛呂仲等一批下層地方文人士紳成長起來，致力於宗族的建設。從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開始，歷時三十載，到嘉靖

<sup>18</sup> 石堅平，〈建築榮恩祠碑誌考釋〉。

<sup>19</sup> 石堅平，〈建築榮恩祠碑誌考釋〉。

<sup>20</sup> 《東莞茶園衛氏族譜》（咸豐抄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十二世通修譜說〉。據《瀝滄衛氏族譜》，卷10，〈歷代行實〉記載，衛璿「生永樂己丑五月廿八日，卒弘治辛亥四月廿一日。」可見，黃蕭養叛亂時，衛璿正值壯年，親眼目睹了叛亂給地方社會帶來的衝擊。從族譜未曾編修完畢來判斷，衛璿在親身經歷黃蕭養叛亂之後，晚年才開始留心衛氏族譜的編纂。

<sup>21</sup> 《瀝滄衛氏族譜》，卷1，〈譜序〉。

<sup>22</sup> 《瀝滄羅氏族譜》，卷12，〈宗祠〉。

<sup>23</sup> 石堅平，〈建築榮恩祠碑誌考釋〉。

<sup>24</sup> 《瀝滄羅氏族譜》，卷18，〈禮房宗支圖〉。按族譜記載，參與主持嘉靖六年（1527）豎造大宗祠碑的廷璉、廷瑞是羅行中的親房堂祖父，而羅行中又是羅洪才之叔。崇禎十四年（1641），羅洪才因督修廣州城牆有功，得到了廣東巡按授予耆民冠帶的榮耀。由此推斷，羅行中編修族譜應該在嘉靖之後、崇禎之前，大約在萬曆時期。

四十五年丙寅（1566），瀝滘衛氏修建成第一個祠堂——敦睦祠。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和萬曆十六年（1588），先後建成隔橋永思祠和水邊明禋祠。嘉靖二十六年（1547）和萬曆二十四年（1596），再次與東莞衛氏聯宗修譜。<sup>⑤</sup>

到萬曆時期，瀝滘宗族社會基本形成。在衛呂仲等士紳的努力下，瀝滘衛氏宗族通過重新發現「宗支圖」，成功地重構了完整的早期衛氏宗族的祖先譜系，將敦睦祠、永思祠、明禋祠及其他人群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地方社會的強宗大族。<sup>⑥</sup>萬曆五年（1577），瀝滘衛氏為肇基祖衛達夫婦修建墳墓。<sup>⑦</sup>萬曆二十五年（1597），瀝滘衛氏和茶山衛氏首次聯合起來，重修始遷祖寧遠公夫婦的墳墓。<sup>⑧</sup>萬曆二十四年（1596），衛呂仲等瀝滘文人士紳倡議捐款修建大宗祠，萬曆四十三年（1615）開始動工興建，崇禎二年（1629）瀝滘衛氏大宗祠最終竣工。<sup>⑨</sup>

明末清初王朝鼎革的餘波，使瀝滘宗族社會受到巨大的衝擊，原有的地方社會秩序趨於瓦解。羅氏宗族與衛氏宗族在隨之而來的持續動蕩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順治三年（1646）十二月望，清軍攻克廣州。<sup>⑩</sup>次日，四姓海盜就襲取了瀝滘村，搶劫財物、擄掠民眾十七八人，衛冕、衛積為、羅濟飛等許多瀝滘地方精英在變亂中死難或失蹤。<sup>⑪</sup>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成為瀝滘地方社會兩大宗族之間力量消長的重要轉折點。康熙中期開始，瀝滘衛氏宗族又成功地培養出在地域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文人士紳群體。康熙二十六年（1687），衛士英和衛德友分別獲得了丁卯科文、武舉人的身份。康熙五十年（1711）衛藹倫中舉，考授內閣中書、潮陽教諭。衛廷璞、衛應德和衛崇升分別在雍正元年（1723）、乾隆二年

⑤ 《瀝滘衛氏族譜》，卷1，〈譜序〉。

⑥ 《瀝滘衛氏族譜》，卷8，〈歷代行實〉，〈八世宗祐〉。

⑦ 陳大猷，〈宋處士念二郎衛公配謝氏安人合葬墓誌銘〉，見《瀝滘衛氏族譜》，卷2。

⑧ 袁昌祚，〈衛族宋初祖寧遠府君配孺人陳氏合葬重修墓表〉，見《瀝滘衛氏族譜》，卷2。

⑨ 衛文英，〈衛氏大宗祠仗義實錄序〉，見衛家架編，《瀝滘衛氏仗義建祠備錄》（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⑩ 康熙《番禺縣志》（康熙二十五年刻本〔1686〕，番禺檔案館藏），卷14，〈事紀〉。

⑪ 參見《衛氏一脈行實》（民國抄本，瀝滘衛本立藏）；《河東家譜（瀝滘衛氏孟房御史系東漁志宇房稿）》（手抄本，瀝滘衛泰治藏）；《瀝滘羅氏族譜》，卷8。衛積為被四姓強盜俘虜的時間，是紹武丙戌（1646）十二月十六日，而據康熙《番禺縣志》記載：「（紹武丙戌十二月望）總督佟養甲、李成棟帥師入廣州」。由此可見，四姓強盜在清兵入城次日洗劫了瀝滘村。

(1737)和乾隆七年(1742)考取進士功名，入仕為官，成為活躍於朝野的官宦縉紳，晉升為名流士大夫。衛崇濟、衛崇階、衛崇陟、衛其襄、衛可文、衛之垣、衛應選、衛仕隆等八人中舉，衛奉璋、衛有彥、衛士元、衛德復等四人為貢生。他們大多數有擔任知縣、訓導、教諭、知府等職務的經歷，加上數量眾多的府縣學生員，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文人士紳群體。<sup>32</sup>

雍乾時期，是瀝滘衛氏宗族發展的鼎盛時期，以衛廷璞、衛藹倫、衛廷拱等為首的瀝滘文人士紳群體在塑造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的強宗大族形象，培養宗族弟子，交結達官顯貴，積累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的權勢與威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康熙五十年(1711)，曾任潮陽教諭的舉人衛藹倫辭官歸里後，以振興文教、教化桑梓為己任。「見篤志力學者，延譽不去口。族故多文學彥，得藹倫益加振興。」<sup>33</sup>在其積極倡導和組織下，瀝滘修文閣、祀文帝、檢字紙、築筆冢，辦文會，結成聯魁會、泰初社、聚元案等會社，廣邀四方之名流士大夫，以文會友，形成了「以一隅之村落，集四境之名流」的盛況。<sup>34</sup>

除舉辦文會，與名流士大夫交遊唱和之外，瀝滘衛氏宗族在學術上也取得重大建樹。經過30年的長期努力，在親族好友的幫助下，衛廷拱從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獻中，搜羅考訂出道德品行和文章兼優的1150位先正楷模，為他們一一作傳，並收錄每人一篇代表作品，編撰成為《文行集》。《文行集》不僅僅只是一項單純的意義重大的學術成果，其影響遠遠超出學術的範疇，成為瀝滘衛氏宗族擴大其在地域社會中學術聲望和社會權勢的重要手段。除得到瀝滘九位親族兄弟子侄的鼎力支持外，《文行集》的編撰還得到了來自南海(五名)、順德(五名)、番禺(四名)、海陽、嘉應、東莞、新安、增城、翁源、新會、連平等廣東各地，共22位文人士紳的大力襄助。其中，順德梁善長、胡士魁是衛廷拱在粵秀書院的同窗。南海羅元煥是衛廷拱的好友。<sup>35</sup>《文行集》被嶺南名流勞孝與譽為能夠匡世濟俗、「有補於世教」的

<sup>32</sup> 參見乾隆《番禺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冊168，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卷13，〈選舉〉，頁185-202；《河東家譜(瀝滘衛氏孟房御史系東漁志宇房稿)》；《瀝滘衛氏樂肖房譜系》(手抄本，瀝滘衛本立藏)。

<sup>33</sup> 乾隆《番禺縣志》，卷15，〈人物十〉，頁332。

<sup>34</sup> 衛藹倫，《續刻心喜集》(雍正癸丑[1733]抄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卷1，〈祀文帝祝文〉、〈聯魁會祀魁文〉、〈泰初社祀魁文〉、〈聚元案祀文武二帝文〉、〈募化檢字紙引〉、〈請梁康人、許揚雲、蔡暗斯、車圖南四先生衡文啓〉、〈夜會引〉，等文。

<sup>35</sup> 在行實中，「羅元煥」作「羅元煥」。參見衛國驥，〈跋〉，見《衛氏一脈行實》。

典範之作。<sup>⑳</sup> 雍正元年（1723）瀝滘衛廷璞中舉，隨後聯捷進士，雍正五年（1727）知江南建平縣，乾隆元年（1736）被上級保舉推薦入朝為官，先後歷任員外、御史、科給、太僕少卿、鴻臚少卿等職。乾隆十五年（1750）衛廷璞因陳奏建言失當，「鐫秩歸里」。<sup>㉑</sup> 衛廷璞作為名進士，長期在朝為官，為瀝滘衛氏宗族在地域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聲望。致仕返鄉之後，衛廷璞繼續與以省城為中心的地域社會文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聯繫，曾應邀為番禺學宮撰寫〈重建番禺儒學記〉。<sup>㉒</sup>

相形之下，羅氏宗族在遭受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的打擊之後，雖非一蹶不振，終難以重振昔日雄風。康乾時期，除培養出一位舉人羅璇和一位宮廷畫師羅福旼之外，羅氏宗族培養出的都是一些低級功名的府縣學生員。羅氏宗族在地方社會的聲勢、地位已大不如前朝煊赫。瀝滘當地流傳着這樣一個傳說：由於「羅」與「螺」諧音，在羅氏宗族祠堂的前面有一個海水匯聚的深水潭，酷似一個海螺。為破壞羅姓的風水，衛氏宗族在潭的前面，增挖了一條長長的河涌，猶如鋼針，直插在海螺之上。據說海螺被鋼針插死，動不了。自此，羅氏宗族一蹶不振，衛氏宗族則不斷發展壯大起來。<sup>㉓</sup>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故事是，衛氏宗族的祖先在風水先生的幫助下選定好的風水，下葬先人，從而克制住羅氏的風水，而使衛氏子孫興旺發達起來。<sup>㉔</sup>

此外，瀝滘一帶至今還流傳着瀝滘衛氏與員岡爭奪沙田、與上滘打官司、走私私鹽等傳奇故事。<sup>㉕</sup> 無論是「針涌」之類的傳奇，還是爭奪沙田、走私私鹽的故事，都是瀝滘地方社會宗族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現實反映。

由此可見，在衛廷璞、衛藹倫、衛廷拱等文人士紳的精心建構下，瀝滘衛氏宗族的學術聲望、詩文造詣與社會權勢等，都通過重重非正式、私人性的社會網絡，在地域社會中傳播與積澱。精心編織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絡和在地域社會中積累的權勢聲望，又為瀝滘衛氏宗族在宗族競爭、沙田開發、走私私鹽等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基礎。

⑳ 勞孝與，〈文行集跋〉，見衛壯謀輯，《文行集》（乾隆九年〔1744〕刻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㉑ 乾隆《番禺縣志》，卷15，〈人物十〉，頁335。

㉒ 吳道鎔原稿，張學華增補，李棧改編，《廣東文徵》（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書第1集，香港：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校刊，1973-1979），冊5，頁103。

㉓ 參見2005年11月12日、2006年5月20日筆者的瀝滘田野調查筆記。

㉔ 參見2007年3月8日筆者的瀝滘田野調查筆記。

㉕ 詳見2005年11月26日、2005年12月25日筆者的瀝滘田野調查筆記。



為繼續彰顯衛氏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的權勢地位，表達對王朝國家的認同，推廣鄉村禮儀教化，乾隆十二年（1747），瀝涪衛氏宗族模仿鄉飲酒禮，舉辦了一場規模盛大的聯壽宴會。

## 二、鄉飲酒禮與瀝涪衛氏聯壽宴

鄉飲酒禮是自西周一直流傳下來的王朝國家制定和推行的官方禮儀。按照唐代賈公彥的說法，鄉飲酒禮有四，其一為「黨正飲酒」，儀式上「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sup>④②</sup>按《宋史》的說法，「鄉飲之禮有三……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二也。」<sup>④③</sup>雖然鄉飲酒禮「自周迄明，損益代殊，而其禮不廢」，<sup>④④</sup>「敬老序齒」一直是鄉飲酒禮的核心議題之一。

明代官府對鄉飲酒禮進行重大改革，統一禮儀，增加了讀律的環節，突出了對基層民眾進行教化的功能。<sup>④⑤</sup>「洪武五年詔禮部奏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十六年詔班《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之。」<sup>④⑥</sup>

清沿明制，順治元年（1644）規定，京府暨直省府、州、縣，歲以孟春望日（農曆正月十五日）、孟冬朔日（農曆十月初一）舉行鄉飲酒禮。<sup>④⑦</sup>雍正元年（1723）發佈上諭，稱「鄉飲酒禮所以敬老尊賢，厥制甚古」，規定「順天府行禮日，禮部長官監視以為常。」<sup>④⑧</sup>乾隆二年（1737），河南按察使隋人鵬上奏稱，鄉飲酒禮「年久視為具文，而府縣等官多不能凜遵明訓，實心奉行」，建議統一儀式，勤加舉行」，引起了朝廷的重視。<sup>④⑨</sup>乾隆八年

④② 賈公彥，《儀禮注疏》（《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原日〉。

④③ 脫脫等撰，《宋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卷115，〈禮志十八〉，〈鄉飲酒禮〉，頁318。

④④ 張廷玉等撰，《明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卷56，〈志〉，〈禮十〉，〈鄉飲酒禮〉，頁145。

④⑤ 劉亞中、李康月，〈「鄉飲酒禮」在明清的變化〉，《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頁81-88。

④⑥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56，〈志〉，〈禮十〉，〈鄉飲酒禮〉，頁145。

④⑦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卷96，〈禮志八〉，〈鄉飲酒禮〉，頁367。

④⑧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96，〈禮志八〉，〈鄉飲酒禮〉，頁367。

④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鄉飲酒禮史料〉，《歷史檔案》，2002年，第3期，頁3-8。

(1743)，鑑於「各省鄉飲制不畫一，或頻年闕略不行」的狀況，統一規定鄉飲酒禮的禮儀，「嗣後鄉飲賓、介，有司當料簡耆紳碩德者任之，或鄉居顯宦有來觀禮者，依古禮坐東北，無則寧闕，而不立僎名。」<sup>50</sup> 在朝廷的倡導下，河南、江西、四川、西安等地方大員和朝廷重臣紛紛上書，對推行鄉飲酒禮建言獻策。<sup>51</sup>

在王朝國家極力推行王朝禮儀，地方官員積極推行和實踐鄉飲酒禮的背景下，乾隆十二年（1747），瀝涇衛氏宗族模仿官方的鄉飲酒禮，舉辦了一場全宗族的聯壽宴會。論及民間社會對鄉飲酒禮的模仿與實踐，早在南宋時期，有的地方的文人士紳嘗試着將鄉飲酒禮運用於耆老會等民間結社之中，使之成為專門的尚老儀式。<sup>52</sup> 在元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民間儒士開始模仿參照官方舉辦的鄉飲酒禮禮儀，自發舉行鄉飲酒禮。<sup>53</sup> 明代改革鄉飲酒禮的過程中，強化了對民間社會舉辦鄉飲酒禮的禮儀管理。民間里社必須按照官方規定的程式舉行鄉飲酒禮。「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有酒肴，於一百家內供辦，毋致奢靡。」<sup>54</sup>

瀝涇衛氏宗族繼承了民間社會模仿王朝禮儀，開展鄉村教化的傳統，舉辦了這場聯壽宴會。與衛藹倫、衛廷璞、衛廷拱等瀝涇衛氏宗族文人士紳交往甚密的嶺南名流車騰芳，應邀操刀執筆，草擬聯壽序文。<sup>55</sup> 車騰芳的私人文集《螢照閣集》中，收錄了他為這次聯壽宴會替別人草擬的序文〈番禺衛氏合族聯壽序（代）〉。車騰芳在序文中，直接表明了瀝涇衛氏宗族舉辦這次聯壽宴會的由來：「今上御極之初，絹帛有賜，粟肉有加，令直省州縣行鄉飲禮。髮禿齒危，均沾異數，至優且渥。衛氏能體此意，以行於一家之中。皤皤黃髮，畢集一堂；子姓孫曾，環立左右。五豆六豆備其物；奉幾奉

<sup>50</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96，〈禮志八〉，〈鄉飲酒禮〉，頁367。

<sup>5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鄉飲酒禮史料〉。

<sup>52</sup> 周揚波，〈南宋四明地區耆老會概述〉，《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年，第5期，頁66-70。

<sup>53</sup> 申萬里，〈宋元鄉飲酒禮考〉，《史學月刊》，2005年，第2期，頁28-36。

<sup>54</sup> 申時行等修，《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據1936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本影印），卷79，〈鄉飲酒禮〉，頁456。

<sup>55</sup> 車騰芳是瀝涇衛可文的恩師，替衛廷拱的《文行集》撰寫過序文，應衛藹倫之邀多次來瀝涇參加文會，與衛廷璞父子也互贈詩文，往來唱和。衛藹倫逝世後，車騰芳還作挽詩〈挽衛儕香先生〉，以紀念亡友。參見車騰芳，《螢照閣集》（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衛壯謀輯，《文行集》；衛藹倫，《續刻心喜集》。

杖昭其儀。覺唐虞三代去人不遠，而太和雍睦之氣猶在人間。」<sup>56</sup> 由此可見，乾隆初年朝廷努力推行鄉飲酒禮、實施教化的政策，是促使瀝滄衛氏宗族舉辦聯壽宴的重要原因。「衛氏能體此意」中的「此意」，即鄉飲酒禮的敬老禮儀。「以行於一家之中」，則表明瀝滄衛氏宗族就是要將原本官方舉辦的王朝禮儀，創造性地運用於民間社會的宗族禮儀之中。「皤皤黃髮，畢集一堂；子姓孫曾，環立左右。五豆六豆備其物，奉幾奉杖昭其儀」，聯壽宴上的宗族儀式直接脫胎於官方舉辦的鄉飲酒禮的敬老禮儀。

衛廷璞等縉紳士大夫是瀝滄衛氏宗族模仿官方的鄉飲酒禮，舉辦聯壽宴會的積極推動者。衛廷璞是雍正元年（1723）的進士，乾隆元年（1736）開始長期在內朝為官，身處朝闕，了解朝廷推行鄉飲酒禮，以移風易俗、施行鄉村教化的政策和意圖。故而，他積極地推動瀝滄衛氏宗族模仿鄉飲酒禮，用王朝禮儀改造宗族禮儀，舉辦聯壽宴會，以達到移風易俗、教化鄉里、敦睦宗族的目的。

為此，衛廷璞等人不僅托車騰芳代寫序文，而且請朝廷重臣張廷玉為之署名。「兵科給事筠園衛君，予癸卯禮闈所得士也」，暗示出序文名義的撰寫者與衛氏宗族名進士衛廷璞之間，存在着座主與門生的私人關係。<sup>57</sup> 對於張廷玉來說，除了各種私人性的考慮之外，在朝廷推廣鄉飲酒禮以移風易俗的背景下，通過壽序彰顯朝廷的盛世風尚，既符合其身份，又是他願意做的事情。張廷玉可能在車騰芳草擬的序文基礎上，通過局部刪改，最後署名。宣統《番禺縣續志》中刊載了一份題為〈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的文獻，文末署名為張廷玉頓首拜撰、汪由敦頓首拜書。<sup>58</sup>

瀝滄衛氏宗族在衛廷璞等文人士大夫的倡導下，參照官府舉辦鄉飲酒禮的禮儀，舉辦聯壽宴，形成了一套地方社會的宗族禮儀。衛氏宗族邀請車騰芳草擬的序文，突出強調了瀝滄衛氏在聯壽宴儀式方面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強調此舉與王朝禮儀和官方政策的內在一致性，從而表達出鄉村社會對王朝國家的認同。聯繫到前面提到的「爭奪沙田」、「走私私鹽」等民間傳說故事，可以預見，一場中規中矩、符合王朝儀軌和儒家倫理規範的宗族禮儀，

<sup>56</sup> 車騰芳，《螢照閣集》，卷10，〈番禺衛氏合族聯壽序（代）〉。

<sup>57</sup> 衛廷璞，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舉人，聯捷進士，主考官是張廷玉，自然張廷玉成為衛的恩師、座主。衛廷璞前任建平縣令，至乾隆元年（1736）轉入京城為官，此時任兵科給事之職。見乾隆《番禺縣志》，卷15，〈人物十〉，頁333-335。

<sup>58</sup> 宣統《番禺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民國二十年〔1931〕刊本），卷36，〈金石志四〉，〈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頁502-503。

能夠為衛氏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積澱起更多的道德倫理上的文化優越感和宗族權勢聲望。

為了將模仿官方鄉飲酒禮產生的宗族禮儀延續下去，為了進一步彰顯和炫耀通過舉辦「聯壽宴」，在地域社會中所積澱起來的權勢地位與宗族聲望，瀝滄衛氏宗族在「聯壽宴」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新的定期舉辦的宗族禮儀——「賢壽宴」。「聯壽宴」被改造成為定期舉辦的「賢壽宴」，並且擴大了範圍，除了原來的「壽」之外，還將地方精英作為「賢」吸納進來，形成一種新的鄉村宗族禮儀。衛氏宗族的賢壽宴定於每年正月十五日舉行。

為使賢壽宴的傳統能夠長期延續下去，並有穩固的經濟基礎，瀝滄衛氏宗族內部以作會的方式籌集資金，組成一個宗族公共基金——「大宗祠賢壽會」，專供舉辦賢壽宴之用。「大宗祠賢壽會」原簽簿中衛福源、衛藿茂父子和衛懋功均有簽題，而沒有衛懋功之父衛秉昌的簽題。<sup>59</sup>查衛寶善堂所藏《瀝滄衛氏家譜》可知，福源公生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卒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衛藿茂生於雍正元年（1723），卒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sup>60</sup>查衛宗達藏《瀝滄衛氏宗族譜》可知，衛懋功生於雍正九年（1731），卒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而衛秉昌生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卒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sup>61</sup>這意味着瀝滄衛氏宗族在乾隆十二年（1747）舉辦全族聯壽宴時，衛福源和衛秉昌均48歲，衛懋功16歲，衛藿茂24歲。「大宗祠賢壽會」發起簽題之時，衛秉昌可能已經去世，衛懋功已經開始支撐門戶。否則，難以解釋為何讓16歲的兒子衛懋功參加簽題，而正值壯年的衛秉昌本身缺席簽題。「大宗祠賢壽會」發起簽題時間，最遲不超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此年衛藿茂去世。如果這一推斷正確的話，那麼「大宗祠賢壽會」發起簽題時間在衛秉昌去世之後，衛藿茂去世之前，即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間。

「大宗祠賢壽會」共由愷、悌、君、子、攸、同、萬、福共八個字號組成，被編為愷悌、君子、攸同、萬福四股，四股輪值當祀。<sup>62</sup>「大宗祠賢壽會」每年運營所得，除支付舉辦賢壽宴儀式所需開支外，還在當年輪值字號之中按股份發放席金，回饋捐題者及其子孫。「愷悌字號共壹佰叁拾捌份，

<sup>59</sup> 《光緒元年抄各祖留祭原簽簿》（光緒抄本，衛寶善堂藏）。

<sup>60</sup> 《瀝滄衛氏家譜》（20世紀50年代抄本，衛寶善堂藏）。

<sup>61</sup> 《瀝滄衛氏宗族譜》（民國抄本，衛宗達藏）。

<sup>62</sup> 《光緒元年抄各祖留祭原簽簿》。

值理之年每份約分席金銀壹錢伍分左右。」<sup>63</sup>

至此，瀝潯衛氏宗族不僅擁有了一套穩定的，表達和彰顯自身在地域社會中權勢與聲望的社會文化機制，而且使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地方社會權力精英，擁有了一個參與儀式表演，表達自身在宗族與地域社會中地位與權勢的舞臺。

### 三、從「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到「御賜屏風」的演變

隨着衛藹倫、衛廷拱和衛廷璞等在地域社會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瀝潯精英的去世，到乾隆後期，瀝潯衛氏宗族在科舉功名方面開始由盛轉衰。自衛仕隆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預行己酉正科舉人之後，瀝潯衛氏宗族在科舉功名上默默無聞，毫無建樹。<sup>64</sup> 嘉道咸時期，只有衛子壯一人是嘉慶元年（1796）歲貢，曾任海康訓導。<sup>65</sup> 直到同光時期，瀝潯衛氏宗族在科甲功名方面又有點起色，衛維清和衛家渠分別是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與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補行庚子恩、正併科舉人。<sup>66</sup> 衛應麟為光緒朝歲貢，年次失考。<sup>67</sup> 衛榮鑒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丁酉副貢、高要訓導。<sup>68</sup> 儘管如此，瀝潯衛氏宗族在科舉功名方面，再也無法重現當年「三進士十舉人」、「九龍出海，六鶴飛歸」的空前盛況。<sup>69</sup>

嘉慶以來，羅氏宗族在科舉功名上雖然無法與乾隆時期的衛氏宗族相比，然而，面對逐漸由盛轉衰的衛氏宗族，也逐漸取得了與衛氏宗族相抗衡

<sup>63</sup> 《光緒元年抄各祖留祭原簽簿》。

<sup>64</sup> 同治《番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同治十年〔1871〕刊本），卷12，〈選舉表三〉，頁119；《瀝潯衛氏族譜》，卷4，〈宗支圖〉。

<sup>65</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2，〈選舉表三〉，頁120；《瀝潯衛氏族譜》，卷4，〈宗支圖〉。

<sup>66</sup> 同治《番禺縣志》，卷12，〈選舉表三〉，頁128；宣統《番禺縣續志》，卷16，〈科目〉，頁219；衛家渠編，《瀝潯衛氏仗義建祠備錄》，〈重修大宗祠仗義眾孫題簽千子會名份錄〉。

<sup>67</sup>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16，〈科目〉，頁220；衛家渠編，《瀝潯衛氏仗義建祠備錄》，〈重修大宗祠仗義眾孫題簽千子會名份錄〉。

<sup>68</sup>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16，〈科目〉，頁221；衛家渠編，《瀝潯衛氏仗義建祠備錄》，〈重修大宗祠仗義眾孫題簽千子會名份錄〉。

<sup>69</sup> 衛惟清，《瀝潯衛氏敬字會會份簿》（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瀝潯衛舜庭家藏），〈勸簽敬字紙會小引〉。

的成績。羅日章，嘉慶五年（1800）副貢、瓊州府樂會縣教諭。<sup>⑦</sup> 羅家驥，嘉慶二十三年（1818）戊寅恩科武亞元、誥授武略騎尉、廣東全省塘務分府。<sup>⑧</sup> 羅森，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拔貢、江西金溪縣知縣。<sup>⑨</sup> 羅川，同治七年（1868）戊辰歲貢、候選國子監典籍。<sup>⑩</sup>

在失去衛廷璞等官紳的有力庇護之後，瀝滘衛氏宗族不僅可能減少走私私鹽，爭奪沙田等獲利經濟資源的機會，而且其在鼎盛時期奠定的在地域社會中的權勢和地位，也逐漸受到威脅和挑戰。嘉慶二十二年（1817），瀝滘衛氏宗族與東莞衛氏宗族遵奉的共同始祖寧遠公墓地，被博羅縣泊頭鄉的翟氏宗族子孫佔葬。東莞生員衛文勳等率眾赴博羅縣衙控訴，經官紳調停，最終迫使翟氏宗族作出遷墳、不准佔葬的承諾。<sup>⑪</sup> 為震懾翟氏宗族，彰顯衛氏宗族的權勢與地位，南海名進士馮廣颺被請來撰寫重修始祖墳墓銘文。<sup>⑫</sup>

隨着科甲功名的衰落，瀝滘衛氏宗族也逐漸失去了對瀝滘地方社會穩定而持續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周邊佃耕者聚居而成的村落，開始敢於以對簿公堂的方式來挑戰其傳統權威。同治、光緒時期，瀝滘衛氏宗族與廈滘村各姓佃戶就收禾更的問題發生了長期的訴訟糾紛，兩次對簿公堂。<sup>⑬</sup> 廈滘村和上滘村原本都是瀝滘衛氏等周邊大族開發出來的海中沙田，由各姓佃戶耕種。佃耕的農戶逐漸聚居在一起，發展成為村落。然而，廈滘和上滘在戶籍圖甲等方面歷來都是附屬於瀝滘，瀝滘衛氏宗族一直擁有着在廈滘、上滘一帶組織巡丁更夫，防止盜割、徵收禾更穀的權利。或許是在雍正以來允許蛋民上岸居住的王朝法令的逐漸影響下，這些佃耕定居的村落獨立性與自主性不斷地增強，開始逐漸挑戰瀝滘衛氏宗族在地方上的傳統權威。廈滘村佃戶先後兩次赴番禺縣衙，控告衛氏宗族增加禾更津貼、拒賠盜割稻穀、強化收割管理的規章制度。番禺縣衙判決瀝滘衛氏宗族應遵前斷，並刻碑銘文，昭示後世。在上滘村，坊間同樣也流傳着在王巡撫的幫助下，上滘人同瀝滘人發生

⑦ 同治《番禺縣志》，卷12，〈選舉表三〉，頁121；《瀝滘羅氏族譜》，卷11，〈仕科〉。

⑧ 同治《番禺縣志》，卷13，〈選舉表四〉，頁139；《瀝滘羅氏族譜》，卷11，〈仕科〉。

⑨ 《瀝滘羅氏族譜》，卷11，〈仕科〉。

⑩ 《瀝滘羅氏族譜》，卷11，〈仕科〉。

⑪ 〈衛氏始祖博羅山堂判和息碑〉，碑今存瀝滘衛氏大宗祠內。

⑫ 馮廣颺，〈衛氏墓銘〉，該銘文碑依然立在博羅縣泊頭村附近。

⑬ 〈廈滘瀝滘互控增收更穀案碑〉，碑今存廈滘村外的草叢中。

糾紛打官司，最終獲勝的故事。<sup>⑦</sup>

面對諸如此類的威脅與挑戰，瀝滄衛氏宗族除了赤裸裸地憑藉暴力強權，來捍衛自身的權威與利益之外，更需要靈活地運用各種社會機制和文化手段來彰顯宗族的權勢，維持強宗大族的地位。作為衛氏宗族鼎盛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記憶，聯壽宴又成為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文化資源。在瀝滄衛氏宗族文人士紳的操縱下，聯壽宴逐步演變成瀝滄地方社會普遍認同的一種社會集體記憶。

前文已經提到，衛廷璞等瀝滄文人士紳托嶺南名流車騰芳，代朝廷重臣張廷玉草擬過一份〈番禺衛氏合族聯壽序〉。該序文不僅彰顯出瀝滄衛氏宗族舉辦聯壽宴所運用的宗族禮儀，與王朝官方禮儀鄉飲酒禮的淵源關係，而且巧妙地凸顯出瀝滄衛氏宗族與名流巨宦之間存在的特殊關係，提高其在地域社會中的權勢與聲望。

在這份聯壽序文的基礎上，瀝滄衛氏宗族圍繞着聯壽宴會，不斷地進行着文化建構和禮儀實踐，以繼續彰顯宗族鼎盛時期昔日的榮耀和權勢。「石刻銘文」成為瀝滄衛氏宗族延續和重構乾隆十二年（1747）「聯壽宴」的地方社會記憶的手段。宣統《番禺縣續志》刊載了一份題為〈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的文獻。

通過將車騰芳代擬的〈番禺衛氏合族聯壽序〉，與宣統《番禺縣續志》刊載的〈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比較、鑒別後，我們會發現，文本之間除了數處文字稍作修飾、潤色之外，還存有不少耐人尋味的差別：

1、「願乞予言以為壽筵光也」一句中，「乞」字被替換成「借」字。「乞」表達的是位卑者對位高者的請求，符合車騰芳所希望表達的意思，然而，在石刻中被替換成「借」。「借」比「乞」更多體現出地位平等的姿態，隱去了「乞求」的意味。

2、「今歲冬，過予邸第，言其族之老者由杖鄉國以迄耄期，凡七十有奇」一句中，「凡七十有奇」被修改為「凡百有奇」。相應地，「今一門稱壽者，乃至七十餘人」一句，被改為「今一門稱壽者，乃至百人」。這意味着受到祝賀的壽翁的數量一下子由七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以此類推，聯壽宴會的儀式和規模也相應地被誇大、放大。

<sup>⑦</sup> 參見2007年正月初二日筆者的上滄村田野調查筆記。年近九旬的阮老先生告訴筆者，上滄與瀝滄打過一場官司，具體什麼官司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土地糾紛，因為上滄村河涌以北的土地是瀝滄人的。結果，一位王巡撫秉公斷案，上滄人贏得了那場官司。

3、石刻序文的落款是，「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兼吏部尚書通家生張廷玉頓首拜撰。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四級門年家眷弟汪由敦頓首拜書。乾隆丁卯仲春。」<sup>78</sup>

由此可見，相對於車騰芳草擬的序文，瀝滄衛氏宗族在石刻序文中，不僅將出席聯壽宴席的壽翁數量從七十多人擴大到一百多人，誇大了儀式的規模和影響，而且突出強調了宗族成員衛廷璞，與朝廷重臣張廷玉、汪由敦之間的特殊性私人關係，藉以炫耀宗族榮耀、積澱社會聲望。

從車騰芳的文稿到祠堂石刻的文本改變來看，這份石刻不是乾隆十二年（1747）瀝滄衛氏宗族聯壽宴舉辦時的一項賀禮，而是後來瀝滄衛氏宗族文人士紳的文化創造。「石刻上鐫刻的時間」雖然是「乾隆丁卯仲春」，然而，這不是「石刻本身鐫刻的時間」，僅僅是聯壽宴舉辦的時間。「石刻本身鐫刻的時間」在乾隆十二年（1747）聯壽宴舉辦之後，宣統《番禺縣續志》編撰之前。「石刻上鐫刻的時間」與「石刻本身鐫刻的時間」之間的差別，為瀝滄衛氏宗族操縱社會歷史記憶，將宴會規模從七十多人擴大到一百多人，誇大儀式的規模與影響，提供了重構社會記憶的迴旋空間。

今天瀝滄衛氏大宗祠裡面，沒有宣統《番禺縣續志》裡所收錄的〈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能夠見到的是一組高大精美的「御賜屏風」。「御賜屏風」由12塊紫檀木屏風組成，每塊約高3.9米、寬0.7米、厚0.1米，重約30公斤，主體為鑲金陰文正楷歐體，上部和下部都有精美的浮雕圖案。<sup>79</sup>這12塊屏風一字排開，擺在衛氏宗祠「慶源堂」的左側，構成了一個高約3.9米、長約8.4米的巨型屏風。如此做工考究、規制恢弘的巨型屏風，在嶺南地區實屬罕見。

「御賜屏風」上鐫刻的文字，由祝壽題銘、聯壽序文和落款三部份組成：開頭部份的祝壽題銘的句式為「恭祝番禺瀝江……老年臺聯壽序」，其間鑲嵌入衛碧峰翁、菊亭翁、拙隱翁等103位壽翁的名字；中間部份就是聯壽序文的正文；結尾落款部份鐫刻着序文的撰寫者、書寫者，及參與賀壽的朝廷內外大小官員的姓名、職銜與時間。<sup>80</sup>

種種跡象表明，這組「御賜屏風」就是瀝滄衛氏士紳在石刻聯壽序的基

<sup>78</sup> 宣統《番禺縣續志》，卷36，〈金石志四〉，〈瀝江衛氏聯壽序石刻〉，頁502。

<sup>79</sup> 〈廣州海珠區發現一組罕見的清代巨型屏風〉，《羊城晚報》，2002年3月15日。

<sup>80</sup> 「御賜屏風」上的銘文，參見附錄。



礎上繼續進行的一項文化創造。「御賜屏風」上的聯壽序正文，與宣統《番禺縣續志》收錄的石刻聯壽序相比較，除「合而觴之於祠」一句後，多出一個「顛」字之外，與石刻文本完全相同。從落款來看，屏風的落款比宣統《番禺縣續志》記載的聯壽序石刻的落款更為繁複，更有規制。其中，張廷玉的落款不再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現任職銜，而是幾乎涵蓋了他曾經所擁有過的所有職銜，並且落款末尾鐫刻有分別題為「張廷玉印」、「硯齋」和「太保伯大學士章」款識的三方印章。汪由敦的落款文字沒有變化，但同樣加刻了題為「汪由敦印」、「堇堂」、「大司寇之章」款識的三方印章。

此外，「御賜屏風」開頭部份的祝壽題銘文，和結尾部份的賀壽官員群體姓名，都是在石刻銘文的基礎上增加的新內容。「御賜屏風」直接將103位聯壽老人的名字全部鐫刻出來。「御賜屏風」銘文開列的參與賀壽的朝廷內外大小官員，共有177人之多，主要由來自內閣、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寺監等中央衙門的京官群體，和由來自省、府、州、縣衙門的地方官群體組成。不少侍衛、參府等武職官員和候選官員也囊括其中。

如果說車騰芳撰寫的聯壽序彰顯的是衛氏宗族與張廷玉的特殊關係，那麼石刻聯壽序在此基礎上，又疊加一層與汪由敦的特殊關係，而「御賜屏風」所強調的不僅僅是與張廷玉、汪由敦的特殊關係，而是擴大為一個與由整個朝廷內外、大小官員所組成的廣泛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然而，瀝滯衛氏宗族與如此眾多的大小官員是否都建立起比較緊密的關係，頗為值得懷疑。虛飾之處在所難免。例如，地方名流車騰芳被冠以一個子烏虛有的職銜「縣正堂」，列入賀壽的官宦群體之中。<sup>⑧</sup>

諸如此類的文化建構的痕跡，絲毫不會影響木刻屏風在瀝滯民眾心目中的特殊意義，不會妨礙瀝滯民眾以此為依憑去繼續想象、建構和演繹新的鄉

⑧ 舊時知府、知州、知縣均為地方長官，其正式辦公處為衙署大堂，因此稱為正堂。故亦以「縣正堂」為知縣的代稱。車騰芳一度為官，擔任過海豐教諭，不曾任知縣，故不應稱「縣正堂」。車騰芳在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歲逝世，享年八十餘。鑒於車騰芳晚年依然與衛廷璞等瀝滯文人士紳有密切交往，「御賜屏風」上對車騰芳職銜的虛構，不大可能發生在車騰芳還在世的乾隆中期，因此，「御賜屏風」的鐫刻應該至少是乾隆中期以後的事情。2006年5月7日，在瀝滯田野調查的一次訪談中，衛棣儀老人曾稱「御賜屏風」是光緒年間製造的，不知確切否？然而，宣統《番禺縣續志》中只提到石刻聯壽序文，而沒有提到木刻屏風，並且木刻「御賜屏風」的文字又與石刻序文存在着明顯的前後相繼的關係，因此，木刻屏風有可能就是瀝滯衛氏宗族在民國期間鐫刻而成的。即使不是民國時期的產物，也是清中後期的文化創造。至於這份賀壽職官表是否還存在着更多的虛構成份，有待於進一步的考證。

村故事。在口頭傳說中，圍繞着這塊屏風及其銘文，瀝滂地方社會中仍流傳着一個廣為人知的「御賜屏風」的故事：

衛廷璞在朝廷做官，據說是做過太僕寺少卿。他與張廷玉、汪由敦都很熟悉。估計他就告訴了他們村裡有103個百歲以上的壽翁。皇上聽到很詫異，一個自然村有這麼多的壽翁，十分不簡單。估計是乾隆讓張廷玉寫了贊文、做屏風。這個屏風是皇帝搞來的。屏風以前是放在木箱裡面，放在祠堂裡面。每到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就擺賢壽酒，把屏風擺出來。<sup>②</sup>

這是筆者於2005年歲末的一次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的一個關於「御賜屏風」的故事。據筆者調查所知，這個「御賜屏風」的故事在瀝滂周邊地區廣為流傳。將瀝滂父老口中流傳的這個關於「御賜屏風」的故事版本，與屏風本身的銘文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附會、臆測、誤讀、再詮釋、再演繹的成份。

在口頭傳說中，鄉民們誤讀了屏風、石刻上的文字，將屏風上刊刻壽翁的年齡標準，由「六十歲以上」誤解成為「百歲以上的壽翁」。因為車騰芳代擬的序文中明確地提到，聯壽宴會是為「由杖鄉國以迄耄期」的老者所舉辦的，況且屏風上刻有筠園翁衛廷璞的名字，衛廷璞在乾隆十二年（1747）時61歲，享年72歲，並非百歲老翁。

然而，民間口頭傳說中對屏風上所刊刻的壽翁年齡標準的改動，並非僅僅是無意間的誤讀，因為其改動恰好能夠為下文將提及的「御賜屏風」的故事情節進行鋪墊。在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僅僅是103個60歲以上的人在祠堂聚會，還不能夠取得轟動性的效果，更談不上驚動皇帝，於是，人們口頭上有意無意地製造出103位百歲老翁聚會的「事實」，從而使得以引起皇帝的詫異和興趣，使乾隆皇帝命令張廷玉寫贊文、「御賜屏風」的傳聞情節，在民眾心目中變得更合理，符合邏輯。

儘管口頭傳說中「御賜屏風」的故事，也強調衛廷璞、衛氏宗族與張廷玉、汪由敦的特殊私人關係，但「御賜屏風」故事的核心，則是強調乾隆皇帝在其中發揮的主導作用，張廷玉、汪由敦僅僅是奉旨作序製屏而已。對於瀝滂衛氏宗族來說，口頭流傳的「御賜屏風」故事所強調的重點，則是彰顯

<sup>②</sup> 參見2005年12月25日筆者的瀝滂田野調查筆記。

來自於王朝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賜予的榮耀和地位。在當地民眾的心目中，直接來自於皇權的權威，可以用來抵禦地方官府權力的濫用。瀝涇地方社會中關於「燕子斗拱」的傳說故事，也揭示出了同樣的鄉村社會心理。<sup>83</sup>

「御賜屏風」的口頭傳說、木刻「御賜屏風」，與源自「鄉飲酒禮」的賢壽宴宗族禮儀，三者相互配合，共同建構出瀝涇衛氏宗族與王朝國家，與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特殊關係，藉以炫耀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的榮耀與權勢。

#### 四、結語

明清時期是瀝涇宗族社會的形成、發展和成熟時期。瀝涇形成了由羅氏宗族和衛氏宗族主導地方社會發展的局面。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使瀝涇宗族社會一度受到沉重打擊。隨着在科舉功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衛氏宗族在雍乾時期培養出「三進士十舉人」，出現「九龍出海，六鶴歸飛」的盛況。<sup>84</sup>在衛廷璞、衛藹倫、衛廷拱等縉紳士大夫的倡導之下，瀝涇衛氏宗族積極響應朝廷加強推行鄉飲酒禮、實施地方教化的政策，將鄉飲酒禮創造性地運用於宗族實踐之中。他們通過模仿官方的鄉飲酒禮，舉辦「聯壽宴」，創造出新的源於王朝國家正統禮儀的宗族禮儀。

圍繞乾隆十二年（1747）舉辦的「聯壽宴」，瀝涇衛氏宗族開展了一系列持續不斷的文化建構和禮儀創新。無論是邀請嶺南名流車騰芳代擬聯壽序文，還是請序於朝廷重臣張廷玉；無論是石刻聯壽序文，還是製造「御賜屏風」；無論是創立「賢壽會」、舉辦「賢壽宴」，還是傳播「御賜屏風」的故事，這些都是衛氏宗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文化建構，即由不同的宗族精英運用王朝禮儀等國家官方話語，與鄉土民間文化象徵，將自身與真實的或想象的權力中心聯繫起來，從而提升宗族在地域社會中的權勢聲望。士大夫的文字傳統與民間口述傳統相結合，通過操縱和改變社會記憶，瀝涇衛氏宗

<sup>83</sup> 這個傳說圍繞着瀝涇衛氏大宗祠內的燕子斗拱而展開，地方官員率兵來拆毀大宗祠，理由是大宗祠內的燕子斗拱違反規制，只有皇親國戚才能修建。瀝涇衛氏聞訊連忙做準備，在大宗祠的門前的通道上撒滿玻璃、爛米飯等東西，恭候地方官員的到來。地方官員來到大宗祠前面，瀝涇衛氏突然拿出收藏的允許修建燕子斗拱的聖旨出來，逼得大小地方官員直接跪在撒滿玻璃、爛米飯的過道之上，不敢出聲，灰溜溜地離開瀝涇。原來瀝涇衛氏的西樞祖是郡馬，是嘉靖皇帝的外孫婿。瀝涇衛氏宗族在這場與地方官員的鬥法中，憑藉皇室的權威戰勝了地方官員的權力濫用。參見2005年12月25日筆者的瀝涇田野調查筆記。

<sup>84</sup> 衛惟清，《瀝涇衛氏敬字會會份簿》，〈勸簽敬字紙會小引〉。

族一步步地貼近這個「想象的中心」，最初建構起其與某個朝廷重臣的特殊關係，再擴展為與整個朝廷內外、大小官員之間形成的關係網絡，最後創造出地方鄉村宗族與王朝最高統治者的特殊關係的傳奇故事。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的社會精英，因應着不同的社會規範和歷史情境，為這種源於王朝官方鄉飲酒禮的鄉土儀式，傾注了新的權力符號與文化想象。即使是在今天的瀝潯，賢壽宴的禮儀傳統依然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被重新詮釋、演繹和改造，成為瀝潯地方社會敬老愛老的傳統，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sup>85</sup>

（責任編輯：周驚濤）

---

<sup>85</sup> 2007年正月十九日，瀝潯經濟聯社在瀝潯衛氏大宗祠內舉辦「賀元宵敬老活動」。對於主辦者來說，賢壽宴的歷史記憶被塑造和詮釋成為瀝潯的尊老敬老的優良傳統。然而，瀝潯的父老依然津津樂道地給筆者講述着「御賜屏風」的故事，講述賢壽宴的由來，講述此次活動與賢壽宴的內在關聯。新一代不同類型的瀝潯地方精英懷着不同的心理，共同參與到大宗祠中舉辦的此類慶典宴賀之中，各自賦予其迥然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

## 附：「御賜屏風」銘文

## 恭祝番禺瀝江

衛碧峰翁	菊亭翁	拙隱翁	靜剛翁	菁崖翁	蘭菊翁	明千翁	西歧翁
行我翁	秉修翁	仰蘧翁	敬侯翁	渭川翁	茂齡翁	昌華翁	景賢翁
函靜翁	晚香翁	和宗翁	逸堂翁	松軒翁	南壽翁	中正翁	樂泉翁
鬱載翁	理奄翁	允斯翁	濬夫翁	聚聖翁	峨軒翁	燦王翁	公獻翁
漸磐翁	尚卿翁	聖予翁	長公翁	悅賓翁	明作翁	應峰翁	誠齋翁
奠維翁	岵溪翁	傑千翁	躍齊翁	東亭翁	參雲翁	衡州翁	實齊翁
豪長翁	斐齊翁	振楚翁	挺英翁	杞亭翁	宣甫翁	孔祥翁	翰維翁
歧石翁	陟南翁	淇坡翁	秋湖翁	奉山翁	筠園翁	菴溪翁	煥亭翁
鳳亭翁	梅川翁	丕顯翁	兼山翁	公靜翁	定侯翁	丕成翁	公秉翁
智五翁	栢林翁	儔尚翁	秀甫翁	紹康翁	竹隱翁	華亭翁	伏原翁
喬林翁	聽君翁	作邦翁	勵君翁	而吉翁	耀西翁	高齊翁	作猷翁
足君翁	侶曾翁	康伯翁	東嶽翁	五峰翁	達章翁	超章翁	作來翁
肖豐翁	錫三翁	拔顯翁	偏閑翁	煥然翁	爾祿翁	興贊翁	

老年臺聯壽序

自古隆盛之朝，其故家喬木，歷世久長，非但赫厥猷、膺顯秩已也【《螢照閣集》作：非但赫口猶、顯厥秩已也】。必篤生耆耄老成，以為家之儀型、邦之瑞應，與國運相輝映焉。我朝重熙累洽，積有百年。鱗游蠕動，靡不登於仁壽。雖在海隅，而故舊之家，耆艾之士，所在鍾毓，鬱鬱紛紛，蒸蒸乎盛世之休徵也哉！【《螢照閣集》作：鬱鬱彬彬，伊古以來，蓋不嘗有。】兵科給事衛子廷璞【《螢照閣集》作：筠園衛君】，予癸卯禮闈所得士也。績學善文，歷官內外，勤敏著聲，予素重之。今歲冬，過予邸第，言其族之老者，由杖鄉國以迄耄期，凡百有奇【《螢照閣集》作：凡七十有奇】，將以嗣歲之春，合而觴之於祠顛【《螢照閣集》和石刻均無「顛」字】。願借【《螢照閣集》作：乞】予言以為壽筵光也。予聞而異之，史稱文潞公留守西都，集洛中年德齊者為耆英會，凡十有三人，相傳以為盛事。然皆異姓相聚，非有一家之誼。今一門稱壽者，乃至百人【《螢照閣集》作：七十餘人】。耆英之會，於斯為盛。豈非我國家深仁累澤，久道

化成，【《螢照閣集》增：兵凶不生，疵癘不作】，延延綿綿，以至於斯耶！吾聞衛氏為番禺望姓，自先世諱達公，宋時【《螢照閣集》作：自先世某官某公】始居於此。其後族姓日繁，科甲相望，地當瀝海，距羊城十餘里【《螢照閣集》作：不數里】。西接牂牁，東望虎門，潮汐之所灌注，扶輿清淑之所鬱積，以故人文輩出，而高年長德亦往往生乎其間。是則時固為之，抑亦地實使然耶？古先王之崇老也，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月告存、日有秩，典至重也。

今上御極之初，絹帛有賜，粟肉有加，令直省州縣行鄉飲禮。髮禿齒危，均沾異數，至優且渥。衛氏能體此意，以行於一家之中。皤皤黃髮，畢集一堂；子姓孫曾，環立左右。五豆六豆備其物；奉幾奉杖昭其儀。覺唐虞三代去人不遠，而太和雍睦之氣猶在人間。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此也。抑孔子有言：「豐水有芑，百世之仁也。」班固賦西京亦曰：「國承十世之基，家藉百年之業。」衛固文之昭也，其源遠，其流長。藝黍牽車、洗腆致養之風，猶有存乎今！是舉也，於以教孝，於以教悌，老者為以引以翼之休，少者為有孝有德之彥。君子以覘世澤之長焉，徵國運之隆焉，豈第侈長筵、誇燕喜已乎？給事【《螢照閣集》增：君】年六十矣，以職在諫垣，不得歸與斯宴。予故推原本末，相與喜談而樂道之，俾郵札而歸為宗人祝嘏之獻。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內廷供奉、欽命總理事務、經筵日講官、起居注、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三等伯兼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加十三級充世宗憲皇帝實錄文穎總裁官、兼少保、兼太子太保、文華殿文淵閣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充聖祖仁皇帝實錄監修官、治河方略、四朝國史、大清會典、八旗志書、明史總裁官、丁未庚戌殿試讀卷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癸卯、甲辰、丁巳三科會試總裁、禮部尚書署督察院左都御史事，癸卯科順天鄉試主考、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刑部左侍郎充□戌辛丑文武殿試讀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欽命祭告闕里，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講、司經局洗馬掌局事、翰林院修撰、翰林院檢討，充丙戌、壬辰、乙未三科會試同考官、翰林院庶吉士、通家生張廷玉頓首拜撰。

玉張  
印廷

齋硯

士伯太  
大  
章學保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四級、門年家眷弟汪由敦頓首拜書。

由汪  
敦印

堂堊

之 大  
司  
章 寇

家年眷弟工部尚書趙宏恩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統勳 禮部侍郎蔣溥 戶部侍郎提督直隸學政呂熾 禮部侍郎鄧鍾岳 刑部侍郎錢陳群 兵部侍郎陳惠華 內閣學士沈德潛 左副都御史孫嘉淦 左副都御史何國宗 順天府尹蔣炳 左僉都御史稽璜 詹事府少詹事胡中藻 太常寺少卿鄒一桂 太常寺少卿陳大玠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長發 吏科給事鍾衡 左春坊左庶子金德瑛 戶科給事劉芳藹 禮科給事程鍾彥 兵科給事楊二酉 兵科給事胡定 刑科給事程盛修 工科給事閻統璽 工科給事圖爾泰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朱士級 巡視中城監察御史立柱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源 江南道監察御史歐堪善 福建道監察御史葛德潤 翰林院侍讀觀保 翰林院侍讀德保 禮部員外郎葛祖亮 翰林院編修詹肯構 翰林院編修曹經 翰林院檢討陳兆崙 翰林院檢討辛昌五 翰林院檢討劉起振 翰林院檢討李直 行人司司副朱文灝 鑾儀衛經廳田中儀 縣正堂蘇兆龍 縣正堂何如澹 縣正堂車騰芳 縣正堂謝壩 縣正堂張奇微 縣正堂侯應桂 縣正堂孔傳大 縣正堂蘇善成 縣正堂蘇大忠

年眷弟總督河道周學健 陝西巡撫陳弘謀 福建布政使高山 河南布政使王興吾 太僕寺卿熊學鵬 江西按察使黃嶽牧 廣東按察使徐以升 翰林院侍讀學士于振 詹事府左春坊右庶子林蒲封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嚴洞 湖廣道監察御史吳文煥 山東道監察御史張漢 浙江道監察御史薛澂 廣東鹽運使朱謙鳴 陝西分守涼莊道張之浚 南安府正堂游紹安 瓊州府正堂于需 翰林院編修繆曰芑 翰林院檢討王步青 縣正堂李顯祖 縣正堂邱軒昂 縣正堂方嘉發 縣正堂黎偉光 縣正堂謝仲坑 縣正堂陳是集

年眷姪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莊有恭 翰林院侍讀張泰開 翰林院編修金牲 刑部員外郎楊勳 翰林院編修楊述曾 翰林院編修湯大紳 翰林院編修寶光鼎 翰林院檢討胡澤潢 翰林院檢討王太岳 翰林院庶吉士繆敦仁 翰林院庶吉士李清芳 翰林院庶吉士莊有儀 翰林院庶吉士勞通 翰林院庶吉士金洪 翰林院庶吉士徐開厚 吏部主事廖芳蓮 戶部主事梁景璋 禮部主事陶思深 禮部主事熊無龍 兵部主事王戎 工部主事閻循琦 府左堂涂士

炳 府左堂陳鍾瑤 府左堂崔雲龍 縣正堂汪鼎金 縣正堂萬光謙 縣正堂葛曙 縣正堂王銓衡 縣正堂李肯文 縣正堂何毅夫 縣正堂梁善長 縣正堂趙林臨 縣正堂何映柳 縣正堂何廷楠 縣正堂黃壯 縣正堂吳文正 縣正堂李堂 縣正堂陳思齊 縣正堂陳文合 縣正堂徐廷芳 縣正堂劉述元 縣正堂梁喬棟 縣正堂陸日升 縣正堂蘇珥 縣正堂韓超群 縣正堂馬維紀 縣正堂楊仕熙 縣正堂鄭江 縣正堂高忠達 縣正堂梁調元 縣正堂林棟 縣正堂陳炎宗 縣正堂梁元龍 縣正堂梁文勳 縣正堂何元拔 縣正堂任必進 縣正堂何大佐 縣正堂區琛 縣正堂柯光第 縣正堂林尙國

年家眷世侄翰林院庶吉士黃叔顯 縣正堂鄧輿璋 縣正堂朱吉兆 縣正堂何士蛟 縣正堂何劭 州左堂張本 州左堂李允升 州左堂湛文沾 州左堂蘇組 州左堂張旭 州左堂蘇夢篆 州左堂趙季錫 州左堂梁震 州左堂馮正中 門下二等侍衛李世崧 二等侍衛白鍾鑲 三等侍衛黎信中 三等侍衛李如筠 三等侍衛周廷鳳 三等侍衛林炳星 三等侍衛顧鉉 三等侍衛趙璜 三等侍衛田懷智 三等侍衛竇瓊 增城營參府朱科魁 廣州營遊府孫璽桂 縣正堂濮陽模 縣正堂濮陽樓 候補守府劉五福 候補守府楊如秉 候選守府馬仁勇 候選守府陳定舉 候選守府王錫榮 候選守府張宏勳 候選守府歐如雄 候選守府汪之榜 候選守府周冕 候選守府王麟書 候選守府陳希翰 候選守府許大略 候選守府馮元震 候選守府郭振邦 候選守府葉華春 候選守府胡士鵬 候選守府黃明 候選守府李鷹揚 候選守府黃又斌 候選守府羅昭 候選守府漆經 候選守府彭尙忠 候選守府許材勇 候選守府劉時達

皆

乾隆丁卯年仲春吉旦



# Social Memor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Imperial Screen of Lijiao Village, Panyu County, Guangzhou

Jianping SHI

Center for Guangdong Qiaoxiang Research

Wuy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centers on a magnificent carved wooden screen, a legend about the emperor bestowing such a screen, and a local ritual tradition of feasting to celebrate the longevity of local worthies,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a village lineage near Guangzhou in mid-Qing, responding to calls by the imperial court to strengthen the village drinking ritual and transform village custom through education (*jiaohua*), used imperial orthodox ritual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lineage ritual. As part of this newly created lineage ritual they made flexible use of such cultural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as feasts to celebrate longevity, composition of congratulatory texts and stone inscriptions, oral legends about imperially bestowed screens, and the various subjective impressions attached to them, in order to create a tradition, transform ritual behavior, and manipulate social memory, as part of the legitimization of powerful lineages in local society. At different times, social elite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use distinctive cultural strategies to attach different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s to a single text, constructing thereby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village culture.

**Keywords:** village drinking rite, social memo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Lijiao, lineage

---

Jianping SHI, Center for Guangdong Qiaoxiang Research,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hsssjp@163.com.

